

对“打车神器”，不用过于担心

“打车神器”与“公正问题” 2月12日 新民晚报 邵宁

动动拇指，的哥得益，乘客开心，打车软件真可谓“两面讨好”的神器。然而，就在“打车神器”所向披靡之际，有些人却笑不出来，就是那些不用智能手机或没有下载打车软件的乘客。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辆辆亮着“空车”小灯的出租车从面前驶过。

新民晚报一评

打车软件的出现，对于所有的乘客究竟是否公平？加价叫车到底是一种合理的奖励行为，还是一种扰乱市场的行为？如果一种新技术，在使一部分人得到便利和实惠的同时，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，这种技术是否应该推广？

公平正义，永远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。哈佛教授迈克尔·桑德在《公正，该如何做是好》一书中，对诸多涉及经济、社会、法律、道德、伦理的“公正问题”，进行了质问、思考和辩论。打车软件带来

的疑问，也是一个类似的案例，值得进行深入的思考、探讨。

网友声音

@小强的迷宫：市场就是这样，完全放开试试。

@老袁之2014：价高者快，时间也是金钱，没人剥夺你路边等候打的权利，这就是市场经济。与“公平”挂钩，本质上还是“不患贫、患不均”的痼疾。充分的竞争才必然带来最终的公平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“打车神器”是大数据时代的

新生事物。这篇评论提到的“的哥得益、乘客开心”的两面讨好的“美事”，终究只是暂时现象。市场中的竞争力量跑马圈地，陪血本赚吆喝，可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一番攻城略地之后，还是会回归到市场常态。

市场经济本身就是“公正经济”，在一个自由而充分的完全竞争市场，“公正”体现在规则与机会的公平上。而评论涉及到的“公正问题”，主要是指获取公正的能力大小，并不意味着公正已然缺席。只要出租车市场充分竞争，就有新的力量填补市场的空白，不用过于担心“打车神器”一统江湖。

“状元流浪汉”不需要居高临下的教诲

状元该“活给谁看”？ 2月12日 新京报 雨童

8年前，刘宁成家乡四川凉山某县的高考理科状元。可4年前大学毕业至今，他都没找到称心工作，后来沉迷网络，四处流浪。其父亲为此在电话中骂他“给整个县丢脸”。经报道后，这引发热议。

(2月11日《成都商报》)

新京报一评

其实刘宁的经历并不那么“耸人听闻”，类似的故事可能分布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县城——在世俗评价体系中，学而优则有个好前途。而不少成绩优异者也会揣着“人中龙凤”心理：认为“我比他们有出息”，“我要光耀门楣”。可到了大学，他们就“沦落”为普普通通的路人甲，于是陷入心理失衡。

对刘宁而言，生活本不该被别人框定，他可仰望星空，但也该脚踏实地，而不是颓靡度日，靠当网络游戏区里身后跟着一群虚拟喽

啰的“大哥”，来寻找存在感。

网友声音

@八零九零玩时评：代际上升的代价是巨大的，寒门子弟的失意也许并不是个体悲剧，而是带着社会的悲情色彩。

@Rock-李-：区区状元，又如何？文凭只是打工的充分条件，不是必要条件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新闻偏爱冲突性元素，当“理科状元”遭遇“流浪街头”时，故事就充满了张力，也为众多时评同行

提供了言说的空间。不出所料，后续跟进的评论中，有的“伤仲永”，有的批评刘宁没有脚踏实地，有的批评他的父亲活给别人看，还有的归咎到教育的失败等。

报道中当事人的只言片语，刻画的只是抽线条的人生，而没有“设身处地”进入到当事人悲凉、无助的内心世界。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可能起伏，当事人正处于人生的低谷，其中有个人、家庭的原因，也有学校和社会的原因，不一而论。这个时候，当事人需要的是实际的帮助，或许还有心理辅导，而不是居高临下的“教诲”。

他们是在“折返跑”

个人努力如何突破“关系重围” 2月13日 人民日报 任锐敏

春节过后，一个段子在微博上流传，“未来几天，又将是秀兰、翠花、桂芳、大强、二饼、狗剩们陆陆续续变回Linda、Mary、Vivian、George、Michael、Justin的时候了”。

人民日报一评

北上广处于中国现代化最前沿，经济发达、国际化程度高，基本上是“陌生人社会”，人情、关系的重要性相对降低，个人能力的重要程度提升了，没有关系的年轻人也可以找到晋身之阶。相形之下，现代化水平不高、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小城市，资源更多集中在政府手中，“关系”也因此变得更加重要。

这些年来，媒体爆出的“萝卜招聘”、扯出的裙带关系，出自中小城市的比例明显要高。试想，如果有关系，就可以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；没关系，草根逆袭只能是镜花水月，中小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

从何而来？

在这个意义上，与中小城市相比，大城市的优势不只是高楼大厦，更在于相对公平的契约关系。反过来讲，提升中小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，除了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机会，更重要的是规范分配规则、营造公平环境，用法治思维、规则意识取代地域情结、人情关系。

网友声音

@天堂鸟微评：是身份和关系决定命运，还是努力和奋斗创造未来？曾经是许多人的困惑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一会“逃离北上广”，一会“逃回北上广”，“逃离”是真，“逃回”

也是真。年轻人就这样在“逃离”与“逃回”之间，辛辛苦苦“折返跑”。如果说“逃回”是想突破中小城市的“关系重围”，那么，当初的“逃离”，也是因为在大城市的“关系重围”中没有找到突破的缝隙。

所谓“关系重围”，其实就是单一身份的固化。在中小城市的熟人社会，人们受到单一身份标签的局限，工作、学习、办事容易被定格。而市场规则相对成熟的大城市，或许能够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，也就是多一点身份选择的机会。比如从大学生、农家子弟等单一身份，转变为市民、白领、精英或者官员等。但小城市的“关系重围”在大城市同样容易复制，无论在哪里，都需要权利、机会和规则的公平。

更应根除“劳教思维”

警惕“训诫中心”异化为新的劳教所 2月13日 新京报

在去年的法治改革成果中，劳教的废止和信访的弱化最受瞩目。也有人担忧，会不会出现劳教的替代品？近日微博上有网友贴出河南南阳卧龙区“非正常上访训诫教育中心”的图片，并称有访民被非法拘禁在此。还有网友直接称其为“新型劳教所”。

新京报一评

地方上以红头文件的方式“创设”出“训诫罚”，因直接与国家法律相违背，自然应归于无效。

“非正常上访训诫教育中心”本就违法，此时，更当警惕其成为劳教所的替代品，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违法打击上访民众的新工具。有关方面需要依法介入调查，通过违法审查程序明令废止此类红头文件，方可保卫来之不易的法治改革成果。

网友声音

@腰酸背痛腿抽筋-louis：说得好！但如何追责？

@贾元良：“训诫中心”建立者，应当撤职查办！

现代快报再评

十二届全国人大去年底以常委会会议的方式，通过了《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》。该“决定”不仅废除了由国务

院制定的两份劳动教养“规范性文件”，而且宣布“对正在被依法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，解除劳动教养，剩余期限不再执行”。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终结劳教制度，表明了国家加快法治建设的决心和意志。

劳教制度虽然得以终结，但劳教思维却“树大根深”，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留恋过去的管制模式，不惜以种种借口代替法治。河南南阳等地开设的“训诫中心”，名曰“创新”，实则倒退，更是公然违法。

谁愿意接受“务实”一词的嘉勉？

大学生在民工市场求职乃务实的开始 2月13日 重庆晨报 龙敏飞

南京安德门民工市场大年初七开门，其中不乏大学生。记者了解到，开门5天已有100多名大学生登记求职，而其中一名硕士研究生选中了一个策划编辑岗位，月薪3000元。

重庆晨报一评

逃离北上广也好，去民工市场求职也罢，都只是大学生求职变得务实的起点，接下来这些大学生还需要有更多务实理性的举动，如进入企业后，同样不可眼高手低，要有“从零开始学习”的耐心与毅力，要努力融入到这家企业的文化氛围里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无论是大学生去民工市场求职，还是媒体间歇炒作的所谓“逃离北上广”，都体现了“适者生存”的法则，舆论用“务实”一词加以描述，语带鼓励，体现出善意。但一句笼统的“务实”有可能掩盖现象背后的本质：这种“务实”是大学生们主动、积极的选择，还是被动、无奈的选择？是体现在一个公平的竞争性求职市场，还是被各种不公正的显性或隐性规则拒之门外？如果只是后者，谁愿意接受“务实”一词的嘉勉？

当然，作为个体的选择，先就业再择业总比高不成低不就、坐吃山空要明智。但个体的“务实”、明智或者无奈的选择，不能掩盖求职市场中的社会议题，包括规则的修复、体制的完善、市场的健全等。

亲情经不起冰冷的数字“计算”

父母扫雪30里与“陪父母仅一天” 2月10日 北京晨报 温国鹏

大年初八，年后上班第一天，因为陕北降雪天气，为送女儿上班顺利到达火车站，延安6旬夫妇竟然扫雪30里山路，让女儿到达火车站。

(《西安晚报》2月9日)

北京晨报一评

联想到一个让人尴尬的调查结果——记者在天津街头随机采访了30名40岁以下的青年人，近七成受访者表示马年春节陪父母的时间只有一天左右，有的甚至不足一天。我们有多少理由为前者感动，就有多少理由为后者自责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评论将两条新闻揉合在一起，自设议程，具有一定的迷惑性。实质上，这两条新闻并不相关。“父母扫雪30里”新闻中的女儿克服交通不便，“带着喜悦和年货回家”探亲，陪父母过了三天，应该说很孝顺了；而那在大城市里随机采访的“春节陪父母仅一天”报道，根本就不能说明年轻人平时没有“常回家看看”。越是和父母经常见面，越有可能在春节时走亲访友。